

亡命天南的岁月 康有为在新马

张克宏 著



华社研究中心



张克宏 著

亡命天南的岁月：

康有为在新马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华社研究中心

吉隆坡·2006

张克宏著·华研学术丛书 4
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

出版 / 发行
华社研究中心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271806-T)
No.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 603-22734035 传真: 603-22734037
电邮: huayan@streamyx.com
网址: <http://www.huayan.net.my>

校对: 黄宇琛
排版: 丁美凤
封面电脑构成: 陈维钊

印刷
Perniagaan Yakin
16 & 33, Jalan Mewah 3/5, Pandan Mewah,
Ampang 68000, Selangor Darul Ehsan.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
马币 35 元 (RM35)
其他地区 US\$20

前言

康有为 (1858-1927)，广东南海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易号更生；丁巳再蒙难，更号更甦，晚号天游化人。¹

康有为初受业于九江名儒朱次琦，博通经史，鄙弃程（颐）朱（熹），喜好陆（象山）王（阳明）。1879年游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1882年到上海，欲究西方国家进步原因，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1888年10月，鉴于民族危机深重，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以图中国的富强，较系统地提出了改良政治的主张。²

1890至1893年间，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培养维新力量，致力变法理论著述，阐发今文经学以议政，将“三统”说论证为“改制”、“因革”的理论，“三世”说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的系统，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达到“大同”的境域，奠定了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听到“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的消息后极为震动，遂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大清光绪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会试榜发，康氏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不就。5月29日又上书清帝，阐述中国必须尽快变法之道理和步骤，提出自强雪耻四策，即：富强、养民、教士、练兵，深受光绪帝嘉许。8月，与文廷式、陈炽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一说成立于阴历十月初，即阳历11月中），编印《中外纪闻》。11月又设上海强学分会，1896年1月创办《上海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

报馆，鼓吹变法维新。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又赶赴北京，痛切陈言“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瓜分豆剖，渐露机牙”。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传他至总理衙门，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人询问变法事宜。他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思想与李鸿章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并阐述了变法的具体措施。旋又应诏上书，统筹全局，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议新制，设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将所著《俄大彼得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等送光绪帝披览。4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在翁同龢、徐致靖等支持下，得光绪帝召见于颐和园仁寿殿，促成百日维新。此后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都提出改革建议，与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全力策划推行新政，期望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型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³然而，历史终究未能完全按照康有为的意愿发展下去。维新仅百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顽固派便迅即将其扑灭，结果，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康、梁等被迫亡命海外。

就目前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来说，中外史学研究者对康有为的研究已相当深入，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从专著的角度来讲，在传记方面，目前已有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林克光的《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何一民的《维新之梦——康有为》、董士伟的《康有为评传》等；在专题研究方面，有萧公权的《康有为思想研究》、汤志钧的《康章合论》、陈慧道的《康有为大同书研究》等。从资料的发掘与整理的角度而言，有蒋贵麟的《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湾丘海学会编印的

《康南海先生诗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的《万木草堂诗集》、《康有为与保皇会》、《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姜义华、吴根梁编的《康有为全集》等，迄今这类专著和资料汇编加起来有170多种；从论文的角度而言，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和研究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方面，它都可以与其他任何一位近代中国人物的研究相比拟，因篇幅限制，在此不拟一一胪列。

不过，诚如1996年7月23日至25日在青岛举办的“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康有为研究中还存在两个突出问题：其一，在中国思想史界，目前只研究了半个康有为——出亡前（以出亡前与出亡后为界线），或更为严格地说是四分之一个康有为——从上书到政变（康有为一生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即从出生到“二考”出现；从上书到政变；从出亡到回国；晚年）。其二，目前康有为的形象在思想史层面褒贬不一。而就康有为的研究走势来说，除了应在康有为整理重估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方面的贡献上下功夫，对康有为引发的疑古之风应作出新的评价之外，还应对康有为16年海外流亡活动加大研究力度。⁴自1898年10月遁逃日本始至1913年从日本归国终，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长达16年之久。此间，他曾环绕大地三周，行六十万里，游三十一国，足迹遍布四大洲。所到之处，康有为不仅遍游山川，而且还详细考察当地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交通、矿藏、文化、教育、民俗等，同时还组织当地华侨，教以团结互助之道，告以国内情况，勗以救亡图存，将自己的救国职志在海外舒展开来。因此，研究康有为在海外的活动，不仅可以弥补目前史学界对康有为整个人生研究的不足，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将他置身

于世界历史大舞台中，放眼世界，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重新衡量和评价这位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和极具影响的杰出人物。

在康有为游历的三十一国中，笔者现选择他进出次数较多，流亡时间较长，且活动内容较为丰富的南洋新加坡和马来亚作为研究对象。⁵ 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两地作为研究对象，是鉴于目前学术界对康有为在这两地的活动情况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颜清湟的《1899-191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孔教复兴运动》、李元瑾的《从中西报章的报道窥探1900年康有为在新加坡的处境》、王慷鼎的《康有为南游诗中“丹将敦岛”考》等，而我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王慷鼎博士目前对新加坡邱菽园家藏康有为资料所进行的整理工作，相信会对史学界重新研究、评价康有为在南洋的活动有巨大的参考价值），但整体上来说，这种研究尚不够全面、系统、完整。譬如，对康有为进出新马的时间和次数，目前史学界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与错误认识；在研究康有为与国内政治活动及当地侨领邱菽园的关系上也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片面性理解；同时对康有为与这两地华侨的接触及康有为对这两地华侨思想的影响的研究等都嫌不足，为此，针对上述诸问题，本书的研究目的主要有四：

（一）利用报章、家藏资料（特指南洋出版的报刊及新加坡新近发现的康氏信函手稿）以及英国殖民地政府档案，力求认真、详细地考察康有为进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时间和次数，以解决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进出新、马的时间和次数的模糊与错误认识；

（二）通过对康有为在新马流亡期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

件及人文因素等的研究，来揭示康有为在新、马流亡期间的真实处境；

（三）通过对康有为在新、马的哲学、诗歌创作，以及他在新马期间对当地华侨所发表的演说的研究，来系统地探究康有为在新、马的文学成就，以及康有为对新、马华侨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四）通过康有为在新、马的生活片段来考察当时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以及新马华侨对清末维新领袖康有为在新、马流亡前后的不同态度，借以考察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会在新马活动的走势。

本书共分为八章，其中前四章主要以时间为经，日常活动内容纬，采用点面相结合的络结构研究法，将康有为在新马的流亡历程作详细阐述，通过这一努力，我们会对康有为在新马的流亡线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第五章，主要是以个案的形式，来探讨康有为在流亡新马时期所发生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即庚子新加坡“刺康案”问题，探讨这个个案的目的，是为了透视康有为在新加坡避难时期的窘迫心情以及这一事件发生后对康有为想在新加坡继续藏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第六章实际上仍然可以看作个案研究，不过它不再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探讨，而是通过对康有为与当时新加坡侨领邱菽园的交往过程的完整叙述，揭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人物心态，以及康有为在新马流亡时期的艰难处境。第七章主要是对康有为在新马流亡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从内容的角度予以分析研究，藉以考察康有为在新马流亡时期所取得的文学成就。第八章主要是以康有为在新马流亡时期所撰写的两部著作作为研究对象，据以探讨不同的生活环境，特别是流亡生涯对康氏的创作及其思想会产

生何影响；第九章则是通过对康有为在新马所作的几场演说的研究，来探讨康有为的思想对新马华侨在内外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中，对内主要是指对华侨内部的团结起到何种凝聚作用，对外则主要是指它对激发华侨热爱中国起到什么样的催化作用，同时我还想借此探究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在新马的传播。

注释

- 1 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页98。
- 2 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页652。
- 3 同注2，页652-653。
- 4 瞿从海《探索中国近代化的奥秘——“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综述》，见《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页107-109。
- 5 近代新、马两地原本都是英国殖民地，其时有英国海峡殖民地（The Straits Settlement）、马来联邦（Fedarated Malay States）及马来属邦（Unfederated Malay States）之别。海峡殖民地成立于1826年，下辖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三地，俗称三州府；马来联邦成立于1896年7月1日，下辖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四邦，俗称四州府；马来属邦创始于1909年，下辖玻璃市、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和柔佛五邦，俗称五州府。（以上资料参见方显《星马史》〈新加坡：星加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0年，页116-153〉）。为了统一一本书的地域概念，本书将根据当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国界划分来界定康有为在新、马活动时期的地理概念。本文所指的新加坡即当今的新加坡共和国所辖的地域范围；在述及康有为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的活动情况时，本书将一律采用“马来亚”这一称谓，而不是马来西亚，其所辖地区即今新加坡以北，马来西亚国土一部分的马来亚半岛及其所属岛屿。

■ 本书承蒙苏志鸿先生赞助出版经费，谨此致谢。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张克宏，1969-

[Wang ming tian nan de sui yue : Kang Youwei zai Xin Ma]

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 / 张克宏著

附参考资料

ISBN 983-9673-98-X

1. Kang, Youwei, 1858-1927--Travel. 2. Statesmen--China.
 3. Singapore--Description and travel. 4. Malaysia--Description and travel. I. Title.
- 951.0081

华研学术丛书

- (1) 林开忠著
建构中的“华人文化”：族群属性、国家与华教运动
(1999年7月初版)
- (2) 林廷辉、宋婉莹合著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五十年
(2000年6月初版，2002年4月修订版)
- (3) 何国忠著
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
(2002年12月初版，2006年3月第二次印刷)
- (4) 张克宏著
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
(2006年12月初版)

目录

前言	i
第一章 匿迹新加坡 (1900.2-1900.7)	1
第一节 应邀南渡	1
第二节 坐困危城	11
第二章 避居马来亚 (1900.7-1901.12)	47
第一节 蛰居丹将敦岛	47
第二节 闲居槟城	52
第三章 环球之旅前的新马之居 (1903.7-1904.5)	61
第一节 荣禄之死与康有为新马之旅	61
第二节 环球之旅前少滞新马	75
第四章 环球之旅后的新马之居 (1908.10 - 1911.5)	83
第一节 欧美非之旅后再四寓槟城	84
第二节 在南洋的最后岁月 —— 第五、六、七次流寓新加坡	96
第五章 庚子新加坡“刺康案”始末	105
第一节 庚子新加坡“刺康案”发生的 历史背景	105
第二节 庚子新加坡“刺康案”的发生与终结	123
第三节 庚子新加坡“刺康案”的影响	130
第六章 邱康交往述论	137
第一节 超越时空的交往 —— 神交	138
第二节 为了共同的政治理念 —— 生死交	146

	第三节 为情势所困 —— 绝交	151
	第四节 尽弃前嫌 —— 复交	168
第七章	康有为在新马创作之诗歌研究	179
	第一节 感念皇恩	180
	第二节 忧时伤乱	184
	第三节 心系故人	187
	第四节 触景伤怀	193
	第五节 悠闲修身	197
	第六节 绘景状物	200
第八章	康有为在新马之哲学创作研究	207
	第一节 重新解儒的动因与目的	208
	第二节 继续坚持公羊三世说的政制改革哲学	213
	第三节 整合新哲学的尝试	217
第九章	康有为在新马之演说研究	227
	第一节 求强乃立世之本	228
	第二节 合群乃求强之道	234
	第三节 爱国乃合群之因	241
附录	康有为流亡新马大事记	249
	后记	259
	参考书目	261
	中文部分	261
	英文部分	268

第一章

匿迹新加坡

(1900.2-1900.7)

第一节 应邀南渡

一 维新思想在新加坡的传播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封建帝国开始一步步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虽然没有唤醒一向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朝守旧君臣，他们依然泥古守旧，恪守祖宗成法，顽固与愚昧依旧，但国土日丧、主权日削的严酷现实却犹如晴天霹雳，惊醒了并不抱残守缺而又时刻关心祖国前途与命运的部分忧时之士大夫及少数开明官员。他们惊觉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睁开双眼，开始寻找安邦治国之策。

以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最先研究“夷情”，总结“制夷”方略。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于1841年秉承林则徐之嘱，根据林所编的《四洲志》，编成《海国图志》，提出“以夷制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办法，¹主张学习外来新事物，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而开始将目光扩及民用工业。以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江苏吴县人）为代表的

一些思想敏锐、要求改革的早期改良主义者则不仅主张从更广阔的领域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强，而且还针对腐朽落后的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企图解决“君民不隔不如夷”的弊病。²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著列强侵略的日益加紧，边疆危机及民族危机日深，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如陈虬、王涛、何启、胡礼垣等不仅主张剔除种种弊端，采用“兵战”和“商战”与列强相抗，而且指出西方富强之本在于开设议院。郭嵩焘说：议院为英国“立国之本”。³ 早期维新派的“君民共治”思想在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便演进为对君主立宪制度的呼求。1895年，郑观应明确提出应把“开国会、定宪法”作为救国的主要措施。⁴ 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则于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提出了改变官制和公举“议郎”，同年6月30日又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凡有政事，皇上御门，皆令之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立即施行”。⁵ 康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更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康言：“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⁶ 由此，康大声疾呼：“大变则全，小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⁷ 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国，进行改革的维新思潮不仅激荡着十九世纪末的神州，而且还深刻地影响著关注祖国命运的海外华侨。新加坡作为南洋华侨聚居最众之地，无不时刻感受祖国脉搏的跳动，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蕞尔岛国——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西方列强继之群起效尤，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强烈刺激了新加坡华侨，他们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发出了一阵阵催人泪下的呐喊，发人深思，令人觉醒，维新思潮伴随著民族危机的脚步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迅速传播开来。首开其宗的即是《叻报》。《叻报》是由薛有礼于1881年创办的，该报不仅是

新加坡而且也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第一份华文日报。他聘请叶季允为该报的主笔。叶季允，名懋斌，号永翁，原籍安徽，后移居广东。十九岁时进入香港《中外报》工作，二十一岁受薛有礼之聘南来新加坡担任《叻报》主笔。⁸《叻报》向来保守，但在民族危机日亟的关键时刻，它却在那些背井离乡，远涉重洋的华侨中传播了维新变革思想，字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叻报》即直言其心声：

自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发指眦裂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见欺于数岛之倭人也！⁹

接著，该报直陈中国见屈之由及变革之重要性：

当今之世，以地大物博之中国而见屈于国小民贫之日本，有志之士，无不太息咨嗟，激昂慷慨而归罪于将帅。夫前敌诸将，如叶、卫辈，贪庸悒怯，贻误大局，诚杀不足以蔽辜。然使中国早能变化，则人材众、器械利、财物足、守御固、转运便，叶、卫诸人亦断不使滥厕将帅之列，而五大洲各国皆将敬畏中国，区区岛国安敢称兵犯顺哉？¹⁰

到了1895年4月，该报更明地急呼变法已亟不可缓，并指出变法关键在究本与追源。它谓：

居今日而言变法，诚哉亟亟乎不可缓也已！中国自与泰西各国通商之后，未尝不以富国强兵自务，讲求格致，研究测算，创设制造局，建立海军衙门，取法欧洲，不遗余力，日新月异，非复从前。亦可谓善变矣。

乃今日见侮于倭人，丧师失地，几转不如前数十年之尚知自奋。如是而犹言变法，不几为有识者窃笑乎？曰：是不然，中国之变法，但知变其末而未知变其本；但知变其流而未知变其源。¹¹

继之，该报指陈究本追源之因说：

惟是变法必当去弊，而日下弊相仍而无穷，未易以悉数也。约而言之，是在探其害人之所由兴，而穷其病之所由起。斯革一害则百害随之而除，治一病则百病随之而愈。庶几乎平日所积者，为之廓然以清，若不沿其源，不寻其根，既欲革此，又欲革彼，既欲治其一，又欲治其二，用力愈劳，而所积者终不可得而去，此变法之得失，不可不知也。¹²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噩耗传至北京，举国震惊，全国人民都陷入巨大悲愤之中，正如谭嗣同的诗句所描绘的那样：“四万万万人同泪下，天涯何处是神州？”¹³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华民族的觉醒意识在国家的空前灾难下迅速高涨，康有为此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毅然站在时代的潮头，领导云集京城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发动了“公车上书”。康有为壮怀激烈，热血沸腾，以饱蘸中华民族乳汁之笔，挥洒爱国主义的豪情，他用一昼两夜的时间，草出了洋洋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力言当时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情辞慷慨，语意峻拔。忧惧国家危亡、民族沦丧的爱国华侨则同样痛恨清政府的昏匿，《叻报》即曾指出：

中国政教禁令不与时局而俱变，墨守旧章，拘执成法。有人民而不知教育，有土地而不知垦辟，有物产